

新时期电影研究丛书

新时期电影文化思潮

饶朔光 裴亚莉 著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京)新登字 097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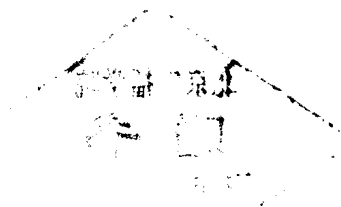
新时期电影文化思潮/饶朔光,裴亚莉著. —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2

(新时期电影研究丛书)

ISBN 7-5043-2964-9

I. 新… II. ①饶… ②裴… III. 电影-流派-研究-中国 IV. J909.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23502 号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复外真武庙二条9号 邮政编码:100866)

河北省地质局地质六队美术胶印厂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850×1168 毫米 32 开 12.125 印张 21 插页 300(千)字

1997 年 2 月第 1 版 199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2000 册 定价:19.00 元

目 录

第一章	伤痕电影:信念与青春的神话及其终结	(1)
第二章	纪实电影:从旗帜到河流	(17)
第三章	啥样的枣子啥样的胡 啥样的核桃啥样的仁 ——论改革电影叙事策略的流变及其内涵	(33)
第四章	文化反思与电影创作	(52)
第五章	娱乐片:商业语境及其艺术观念 ——娱乐片实践、理论和批评的断裂及其“缝合”	(91)
第六章	伟人形象的银幕史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的拍摄与批评	(111)
第七章	主旋律:一种政治权力话语 ——对主旋律影片的另一种解读	(128)
第八章	新时期电影理论批评的历史进程及其走向	(144)
第九章	在天空中 在围墙中 ——怀念第四代之一	(167)
第十章	在情感中 在思辨中 ——怀念第四代之二:对导演的个人述评	(186)
第十一章	氛围·创作·批评 ——第五代电影讨论及其它之一(1983~1987年)	(219)
第十二章	批评·创作·氛围 ——1987年后的第五代电影	(241)

第十三章	站在镜前	
	——从历史与现实角度看新时期电影中的女性及女性意识·····	(266)
第十四章	中国西部与“西部电影”	
	——从无神话的言志主题到对作为类型片的“西部片”叙事法则的一试才具·····	(289)
第十五章	如归的飘泊	
	——新时期城市电影及其对城市的确认 ·····	(311)
第十六章	乡村之声的喧哗、沉寂与复现	
	——新时期农村题材电影概述·····	(328)
第十七章	后现代主义文化与当代中国电影电视·····	(347)

第一章 伤痕电影：信念与青春的神话及其终结

被囊括于伤痕电影中的影片，其本身有一个从政治反思到人性与青春反思的过程。伤痕电影的重要价值和意义，就在于其主题的批判性，在于它准确地记录了那个时代里人们对“文革”悲剧根源的追问，共产党对这一悲剧当中冤假错案的肃清以及人们的控诉，和人们对未来的信念，对共产党人领导全国人民走向政治民主、走向生活富裕的厚望。可以说，伤痕电影更重要的是在尚未消散的悲剧阴云中，在刚刚露出春天的消息的残冬中，由衷地为时代编织的一组信念的神话。正是这一组神话，如同远方的灯塔，在指引着人们走出阴云，走向春天。而伤痕电影对这一时代情绪的准确把握，使得当时的影片成了叙述那个时代的经典文本。其中的激情与旗帜，以及容纳了这些激情与旗帜的形式，都将是难以再现的。这一种难以再现，这一种独一无二的记录性，正是伤痕电影的价值和意义所在。是伤痕电影记录了那个时代的悲哀和亢奋，现实与神话，是伤痕电影展示了那个时代人们的心态、情绪和愿望。

一、“是谁种下这祸殃”

这一句诘问，可说是伤痕电影发轫的旗帜。而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批判，要反思。而批判与反思第一个要标明的态度就是：什么是要支持的，什么是要反对的。换句话说就是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一态度，将决定着经历了动乱之后，承受了巨

大肉体 and 心灵创伤的人们能否对社会对未来重新树立起信念，坚定起信心。显然，这一态度是被做了明确表述的，那就是在政治上以极大的勇气为动乱中冤假错案的平反。这一历史性的举动，反映在影片当中，就是从最早的伤痕电影开始，一直持续了数年之久的控诉及平反主题。这一主题随着时代的发展由显而隐，但反思的深度越来越深。无疑，其影响是久远的。

《神圣的使命》可说是最早的最为典型的平反冤假错案的影片。影片的主人公并没有强奸领导杨大荣的女儿，但是有此罪名，并被投入监狱，可见其冤；杨大荣是为了杀人灭口，消灭罪证，故意设计陷害主人公，可见其假；又冤又假，岂能不错？围绕杨大荣的一群人是冤假错的代表。围绕影片的主人公的另一群人是冤假错的受害受伤者的代表。而老公安战士王同志，则是驱恶除邪的代表。对的与错的，善的与恶的，美的与丑的，就像黑与白那样分明。虽然斗争的困难重重，但终归是有明亮的希望在前方。《泪痕》也是属于同类影片。它们反映的，是正反两种势力的正面较量，是直接的，短距离的。

另外一种 是控诉主题。它们反映的是一小群人的意志和极“左”这一种路线对最广大最普通的老百姓的欺骗和愚弄。如果说，冤假错案是一部分人受到了另外一部人的不公正待遇，冤有头债有主的话，那么，像《枫》、《被爱情遗忘的角落》这样的影片，它所反映的“祸殃”之根源，却是那样的难以判别。在《枫》当中，李红刚和卢丹枫这一对恋人，都是为了“革命的胜利”，成为所谓“战场”上的敌人，直至丧失了生命。这又是谁的罪过？恐怕已经长眠地下的他们至死也还没有搞清楚。青年人不由自主地为潮流所裹挟，心甘情愿地去追赶潮头，并奉献出了自己的青春和生命。《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则是从另一个视角来反映相类的一个问题。贫穷和愚昧是主题的焦点。贫穷控诉的是直接现实性的问题：“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农村政策是导致贫穷的直接原因；而愚昧主题则是历史与现实的交织、沉淀。婚姻交易是自古就天经地义，到今天为什么还意

识不到应该反对；而卖鸡蛋卖蔬菜也是自古天经地义，到今天却为什么要反对？这两种本质不同但在现实当中交织共存的“天经地义”与反对，是现实政治与观念的愚昧加在爱情之上的重压。这一点是《被爱情遗忘的角落》控诉最为痛切之处。

与直接平反冤假错案的影片相比，《枫》、《被爱情遗忘的角落》这样的影片，正反较量的味道要隐一些。这也许与创作者难以排解的激情有关。但是，这两类影片都用经典的现实主义影片的叙述方式，准确而恰当地表述了那一段历史当中人的情绪：简单的故事，简单的框架，但是激情弥漫。这弥漫着的由衷的激情，赋予了这一部分影片以感伤而又真实的艺术风格。

然而，伤痕影片对“文革”历史的表述又不仅仅止于简单的控诉和批判。这一时期电影对祸殃根源的追问和思索，应当是电影主题从控诉到批判的进一步深入。《生活的颤音》、《苦恼人的笑》以及《巴山夜雨》是这一类影片的优秀代表。它们追问和思索是多方面的：

1. 在乱世当中急剧膨涨了的权力欲

十年“文革”给社会造成的动乱局面，使得人们潜藏于心底的，在正常的社会秩序中无法实现的控制人控制社会的欲望有了极好的环境气候和生长土壤。人人都可以打倒对方，推翻上级，自立为王。旧的权威在破坏力面前摇摇欲坠；一些无力在混乱中跳来跳去的人们屈从于新近成长起来的新权威；一些精力充沛但是争权夺利的智慧尚不够高的人追随于所谓权威之后；而那些看透了乱世之本质，其英雄野心被埋没被压抑了多年、信奉“乱世出英雄”、想趁机辉煌一次的人们则兴奋得几乎丧心病狂。他们越是知道这一种乱世的短暂性，他们对正义的压制就越是近于兽行。他们在对人性的践踏当中得到快感。

《神圣的使命》当中的杨大荣，他们为了私怨谋杀李秘书，又为了灭口而栽赃知情者，这罪孽固然不轻，但他在意识到自己来日无多，大势将去的情势下竟不惜以女儿做交易，并决心“牺牲”女儿以

保全自己，这就不能不令人发指了。正是这一种令人发指，将批判与揭露指向更深层次，引发人们对悲剧与邪恶的思考从谬误走向人性的恶。是动乱让人性之恶有了可以展示的舞台，而且是在光天化日之下，无人阻拦。这一种光天化日让那些在运动中深受其害的人们体味到无限的悲凉。正是对人性的恶的批判和揭露，使得影片的探索有了深度，也有了生命力。因为，“文革”毕竟不只是谬误的产物，毕竟也不只是个人冲动所致，潜藏着的人性之恶也是其重要根源之一。

2. 那是谎言的天下

真实与谎言的较量是《苦恼人的笑》着重思考的问题。也许，说是较量有不妥之处，因为事实上，真实的力量和声音是那样微弱无力。在当时的影片当中，人们虽是怀着歌颂新生活歌颂明媚阳光的心情来讲故事，但是刚刚过去的苦难和心灵在虚假当中被扭曲所带来的哀怨与创伤，使得诉说的吸引力远比唱赞歌的吸引力要大得多。更何况，真实与谎言的问题和较量，在人的社会当中，是那样的久远深长，难舍难分。

真实与谎言在人类心灵史上天长地久的较量，使得《苦恼人的笑》在伤痕电影开端伊始就选中了这个话题而在整个新时期电影史上独树一帜，熠熠生辉。“文革”结束之初关于“实事求是”以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使得本片的主题与当时的政治意识形态主流十分吻合，与时代精神的要求也十分吻合。

宋书记毫无疑问是拿谎言惑众的首犯。而《海城日报》的主编是谎言忠心耿耿的走卒。主人公傅彬的同事是个终日被虚伪和谎言俘虏着的悲剧人物。而“我”、“我”的妻子，以及与他们处于“同一战壕当中的战友”们，则在真实与谎言的边缘郁郁徘徊；连走向真实的通道，也是以“谎言”为策略：傅彬为了不上班，开了个假病单——崇尚科学的医生第一次作出了不科学的诊断。（十分凑巧的是：在另一部影片《生活的颤音》当中，居然有如此相像的细节：郑长河为了不去演出，也开了假病单。）可见，真实的人们的智慧也只

是谎言。他们只能在谎言的迷雾下活着。知道真相的人几乎不能完整准确地道明事情的真相。一个小细节结构了整部《苦恼人的笑》：傅彬的女儿打碎了花瓶——一只奇丑无比的老鼠爬上了花瓶，孩子拿起鸡毛掸子要打老鼠，不想却把花瓶打碎了。母亲认为这是孩子故意捣乱。这一小小的冤屈始终没有得到昭雪。剧终的时候，孩子向父亲承认错误，并且保证不做那个说谎的放羊的孩子。但是孩子何尝没有委屈？父母为什么不昭雪这一段冤案？这一问题的答案也可能有两种：一是导演根本没有发现这是冤案，而只是用这个尽人皆知的故事结构电影；二是这里有导演深含不露的深意：真实也有无法认定的时候。

3. 变态的英雄主义

英雄主义与权利欲的膨胀有相关之处也有相似之处，但英雄主义无疑更具有普遍性。它渗透在现实权力的执掌者与追随者甚至被统辖者的心灵深处。英雄主义的舒展与萎缩是那个时代评判一个人生活质量及价值质量的深层标准。在《苦恼人的笑》当中，宋书记的英雄主义与他高高在上的现实权力地位是相连相符的（他住在云遮雾罩的金字塔顶端）；而对记者傅彬来说，“是不是英雄”是他心中一个隐藏极深但难以消除的情结。若与别人一起说谎，他是个追随谎言与骗术的小人（其参照物是英雄）；而如果他为了“自己心灵的安稳，牺牲家庭和孩子”，他看起来便像是一个与虚伪和谎言做斗争的英雄。但是，这是英雄吗？傅彬的妻子质问他的时候，他瞪目无言。这是连同导演在内都难以回答的问题。这一主题的隐藏性和答案的多义性，使得《苦恼人的笑》在真实与谎言的探讨之外，更加丰富，更加深刻。惜乎，伤痕电影很少有类似的探索，直到后来还是很少。

英雄主义的主题在《枫》当中也有较为充分的体现。几句典型的台词可以帮助我们窥见这一种主义的一斑：

卢丹枫说：“鲜艳的红旗上，竟然没有我们一滴鲜血！”

“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

“人在阵地在，至死不投降！”

如果将上述几句台词单单阐释为卢丹枫、李红刚同千万青年毫无区分的赶大潮随大流，这其实并不错。但需要明白的是：这大潮与大流正是由当时青年心中所涌动的英雄情愫所汇集而成。这是夸张了的社会责任心。《枫》当中的英雄主义与《苦恼人的笑》当中的不一样，不像傅彬那样萎缩，不像宋书记那样欺言惑众，年轻的主人公的善良和悲剧结局，都让这一种英雄主义蒙上了一层更加强烈的控诉的色彩：一群迷失了方向和价值观的英雄。控诉得多了，反思得就少了。也不是那样深刻。这里的英雄主义是表述，而上述的是探索和批判。

4. 盲目的从众与遵从权威的心理

在伤痕电影中，盲目从众与遵从权威的人一开始总是被塑造在恶势力阵营中，如《苦恼人的笑》当中傅彬的朋友；《泪痕》中误与坏人走入歧途的老干部；《生活的颤音》当中徐姗姗的母亲甚至她的前任男友韦立，以及《巴山夜雨》当中的女解差刘文英。这些盲从者最终都会受到提醒、教育和感化，他们带给观众的信息是：人，甚至坏人都是可悔改可教育可相信的好人；这一信息固然是令人欣慰的，但如果所有的人都这样来解读影片解谈生活，它却足以造成另一次祸殃的根源：盲目从众，盲目遵从权威的心理。这一种心理是那样普遍，那样根深蒂固，这是十年动乱之所以能够在全国范围内持续十年之久的必要条件。但是这一种心理尚且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伤痕影片中的这一类人物不是没有变化一错到底，就是简单地由不知到知，由不觉悟到觉悟。《巴山夜雨》是较为自觉地表述这一主题的，但开拓得尚不够深刻，有些简单化。随着伤痕电影的走向终结，这一主题就越来越被淡忘。其实，这是反思“文革”悲剧根源极好的切入点！

也许，在多年以后的将来或者不久以后的将来，会有人从这一条途径入手做这件事。那时将是我们民族认识自己心理缺陷的一个里程碑。《芙蓉镇》结尾，王秋赦敲着破锣大喊“运动了”的时候，秦书田对谷燕山说：“若不小心，也许还真的会再有运动。”这一句台词虽然常被人忘却，但它无疑向人们展示了伤痕电影反思的最深处。

俱往矣。但人们绝不应该遗忘。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这是革命导师对我们的谆谆教导。

二、信念的神话

“文革”作为一场历史悲剧，它造成的恶果，就是某种信念的丧失，就是追求信念的勇气和兴趣的丧失。几代共产党人创立并维护的价值观念在这一场大火焚烧一般的运动之后，变得那样的脆弱，甚至于早就面目全非。

真正崇高的信念，不是丧失在那些积极奔走上下跳窜的人心中，比如《苦恼人的笑》当中的宋书记，《神圣的使命》当中的杨大荣。他们心里清楚，这一场运动只是为他们提供了一次爬上权力高峰的绝好机会，与信念无关。但是这一种角色，在许多影片当中，都是空缺的：《巴山夜雨》、《枫》、《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等。角色从显在走向潜在有其意义在，因为这一类角色，事实上绝非哪一个具体的人所能承担，它像一团难以驱逐的阴云，隐匿在平凡的生活与平凡人的背后，笼罩在普通老百姓的头上。它与信念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要打倒的，而非要拯救的。

信念也不是丧失在处于被斗争的最前列的党的领导者，知识分子心中。他们与第一类人一样，认清了这是一场怎样的斗争。他们是拯救人的人，是拯救者。他们要拯救的是下一种人：

这一类人不懂政治游戏的规则，他们只知道努力工作，跟着党走。运动一开始，就被漩涡推挤着，以为这也是党的事业；但是运动

一结束，事事皆非。另一种人，在运动中就一直怀疑，苦闷，但并无完全清醒的认识和足够的信心。它们是属于被拯救、被唤醒、被抚慰的对象。社会的支柱是他们。

伤痕电影的人物关系就是由这三种人组成：作恶者、受伤者、拯救者。时代需要拯救者，时代需要由拯救者所宣扬的神话。否则，一个受伤的民族难以从苦痛中重新站起来，走向新生活。

1. 真理与正义的神话

真理和正义是一对政治性、历史性以及相对性都很强的词语，但是在伤痕电影中，这一种主题频频出现。它们代表着“文革”结束不久后的年代的价值观念。尽管“文革”当中，共产党受到极大的创伤，但昔日的丰功伟绩和将来治理国家的迫切需要，还是将真理与正义的体现者身份赋予了共产党人。一批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者形象在电影中展示着共产党人对真理与正义的承诺。

《神圣的使命》当中，老王同志作为真理与正义的代言人和权力行使者，顶着各方面的压力，为冤假错案平反。这是一个极具宣传意义的片名：领导人民从痛苦与错误的路线中走出来，走向真理与光明，这是历史赋予共产党人的神圣使命。

周恩来一生为党为国为人民鞠躬尽瘁，又在政治斗争中顶受着巨大的压力，在满天阴云中开了一角明亮的天空，因此，“总理逝世，中国的天也要塌下来了，只有哭声。”《生活的颤音》就选用总理逝世作为契机，讲述普通人的故事。总理也就是真理与正义信念的化身。

而在《天云山传奇》中，罗群和冯晴岚没有教导任何人，没有拯救任何人，他们只是相信党，等待党来昭雪自己的冤案。罗群的名言是：“有人要开除我，但是党没有，群众没有，我也没有！”这样的信念，让多少受尽折磨的共产党员咬紧牙关，挺过灰心和伤害，重新走进信念的怀抱；又让多少普通群众，也重新树立了对共产党的信赖。冯晴岚对宋薇说：“不要做阻挠历史前进的人”，那么，可见历史前进的车轮是由罗群、冯晴岚这样的人来推动的。苦难的人们信

赖的就是他们，这些真理与正义信念的神。

2. 诚实与真实的神话

前文已经说过，诚实与说谎，真实与虚假，并非是哪一个时代特别的问题。它们无疑将与人类的心灵史相始终。但是“文革”当中说谎与虚假的泛滥使得这一话题得到了空前规模的大讨论。鲁迅先生因其一生与虚伪斗争的绝对批判性，而成了新时期开端伊始反对迷信反对假权威反对说谎的旗帜与神话。

《苦恼人的笑》是一部关于诚实主题的优秀影片。它描写了一个新闻工作者在说谎的天下力求诚实但又困难重重的故事。鲁迅先生的《立论》一文被作为斗争的旗帜高举着：虽然说谎的人得好报，说真话的人遭打，在那个时代连装哑巴打哈哈也不被允许，但鲁迅先生痛恨说谎，坚决与虚伪斗争以及对虚伪所做的辛辣的嘲讽，还是在人们“郁闷的精神上开了个天窗”。人们读着鲁迅的书，墙上挂着鲁迅的像（《苦恼人的笑》与《巴山夜雨》都有这样的喻意性镜头）。人们都相信，谎言的时代总会过去，真实的时代就要到来。这要到来的时代，就是“文革”的结束。对诚实的讨论（实事求是）标志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开始。

但是虚伪和谎言何曾会消失！是伤痕的年代悲剧的历史束缚了人们作为普通人思想的自由度，误以为只有坏人虚伪只有坏人说谎；是过分谎言过分虚伪的历史将伤痕的年代变成了真实与诚实成为神话的时代。

3. 未来的神话

电影本身就是一种神话。而“文革”给人们带来的心灵的折磨和扭曲，更使这神话充满了梦幻色彩——最美的是未来的。表述未来的色彩鲜丽明亮，其浪漫与诗意绝对令人神往。动乱之前的未被扰乱的生活也用同样的色调描述，这说明：银幕上的过去与现在，都是以鲜花以流水以欢歌笑语作为指向将来的理想模式。

《巴山夜雨》中秋石与妻子恋爱季节的镜头与片尾他与女儿在山野中追逐蒲公英的镜头是那样相似；《苦恼人的笑》当中，记者恋

爱时大海与劫后重逢时的草坪一样美丽；而在《生活的颤音》当中，男女主人公在“文革”之后于乐声所做的鲜花流水以及五彩的光环的遐想也令人欣喜和振奋。伤痕电影不约而同地在用同一种心情同一种手法在表达的同样的心愿。电影发展到后来，这一种手法成为程式固然可厌，但它至少表述了当时人们有乐此不疲不厌其烦地设计将来的心情和精力：心中有神的人是快乐的，心中有神话的民族，即便历尽劫难，也是有希望的。

很难找出哪一部伤痕电影中没有孩子的角色。孩子是未被描述的未来对经历了动乱参与了动乱的成人提出要求提醒责任的人。他们并非处于故事的中心，他们于故事中心点的距离，恰好足以影响故事发展的方向。《神圣的使命》中，老王同志去家访，辞别时孩子说：“王伯伯，再见！”老王就尤其若有所思；《巴山夜雨》中如果没有孩子，秋石的冤案虽冤，但就难以引动同样的同情心；而在《生活的颤音》中，张长河朋友的孩子坚持要戴小白花悼念总理；《枫》的开头，孩子问父亲：

“是谁埋在这儿？”

“为什么？”

“为什么？”

“他们被谁骗？”

父亲说：“好在我们已经迎来了春天。”

孩子们在要求着错误者的悔过自新，正义者的坚定与自信，还有难以推卸的责任。

有意思的是，后来的影片中，很少有用孩子的出现来提醒成人责任心的故事了。《黑炮事件》当中片尾赵书信在茫然当中看着孩子游戏，然后茫然地走开，只是茫然而已。孩子的出现与未来与责任心都无关，也许只是在暗示赵书信自身尴尬处境。因此，以孩子作为手法来象征未来，这不是某一部电影的问题，“孩子”的成功运

用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精神状况和思想状况。不是技巧的拙劣——现今有些电影也用孩子来提醒善良与无辜，但都不成功，这是因为信念的神话、未来的神话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不是仅有一个蓝图就能勾起人们梦想将来的年代了。但是，正是那一段有神话有梦想的年代，支撑着人们走到了虽说没有劫难但也没有神话和梦想的今天。是伤痕电影记录了那时的信念与神话，它将永远勾起我们对过去对神话的怀念。

三、第二主题：青春的逝去与追回

如果说，一开始的伤痕电影是在表述信念的丧失与追回的话，那么，在这一主题得到表述上的完整与满足之后，电影开始提出了另外一个问题：在动乱中逝去的青春，可以追回吗？在动乱中失去的爱情，也可以追回吗？这两个问题的提出，标志着人们对“文革”的反思和批判，已经开始从政治意识形态的裹挟下走了出来，走向被伤害的个体的心灵。《小街》是这一类影片的优秀代表。

一个母亲被打成反革命，因采药被人抓获剃掉头发的女儿，从此只能穿着男子的服装，装成小伙子出现在人群中。另外一个同情她关怀她最后爱上她的男青年，因为想要将她恢复成真正的姑娘，去偷了剧团一根长辫，送钱的时候被人发现，打伤了眼睛。从此二人音信全无。一个十分简单的故事，但却是一部毫不简单的影片。

1. 人性的失去和追问

在动乱中受到伤害的，不只是政治权利的被剥夺和意识形态的被扭曲。人应当具有的最起码的东西都有可能被强暴，被践踏。比方说女孩子的头发。如果说头发只具有头发的意义，那么《小街》的故事将无从讲起。但关键的是头发是女孩子之所以是女孩子的原因，它与隆起的胸部一样（女主人公俞为了伪装，每日缠胸）是女性美、青春美的标志。这些标志的被剥夺被伤害，说明的正是动乱把人之所以是人的本质都破坏了。它涉及的是人的心灵深处。革

命小将们打伤的不是男主人公别的部位，而是眼睛，这一用来辨别是非，了解事实真相的所谓心灵的窗户。主人公惨遭毒打的地点不是别的地方而是动物园这个人与兽相聚首的地方。影片选中人体的特征和特殊的地点讲故事做文章，显然并不是毫无意义而且正是取其特定的隐喻。所以，医生在为男主人公治眼睛的时候，问他：“你要去看谁？是朋友？还是仇人？”那是一个黑白分明的时代。但是敌友又是那样难辨。动物园里善良的老大爷背他出园的时候说：“快要走出动物园了。”这又是一句隐喻性极为明显的台词。人们渴望着走出兽性的践踏，走进人性自由的家园。

2. 对逝去的青春的追回

《小街》有一个没有被固定的结尾，这在电影语言革新史上，无论是过去还是将来都是不能忽略的一页。但这种结构无疑也是有意味的形式：如夏、俞这样经历了青春劫难的人，找回青春是多么的不容易！无数未来的路摆在眼前，既是挑战，也是困惑。《小街》当中明天一定美好的主题就比前几部讨论信念的伤痕片要淡下去许多。它更多展示的是在伤痕中人的心灵史——明天会怎样呢？

其实，对逝去青春的追回以及追回不得的伤逝感，《牧马人》当中也有。许灵均被落实政策之后，领导告诉他，让他做小学教师，并补发给他 500 元时，他伏在桌上嚎啕大哭。在《牧马人》当中，许灵均心灵上所受的伤痛一直是被克制被压抑的。但这绝非等于没有。相反，这正反映了谢晋讲述伤痕故事的高妙之处。不需有许多表现伤痛的场面，这一哭，足矣！无论祈连山有多少让许灵均留连的乡亲和大自然，将青春交付给这 500 块钱说到底是一场难以言说的悲剧。

青春主题是一个开放主题。因它与人性的直接关系，在伤痕电影和以后的以“文革”为题材的影片当中，它或隐或显地总会得到描述，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对“文革”的表述也越来越姿态各异。难以用一种心情来评说人们——不同时代的人们对“文革”历史的评价了。但有一点不容质疑：人们都是从关注青春出发，关注

“文革”这一段历史。控诉的声音越来越稀薄，反思的滋味也越来越淡，倒是怀旧的情绪越来越浓了。已经换了一批舞台面孔了，历史在朝前走着。《头发乱了》和《阳光灿烂的日子》，都显然有一种异样的声音——这种异样的声音能被观众接受，绝非事出偶然：已经是由一批没有伤痕的人来讲述伤痕年代的故事了。

新的季风正在吹着。它与伤痕已经无缘。它与信念与神话也已无缘。但它有关青春，并非青春神话。青春像每天早上吃过的早点，实实在在的，想起的时候都有些好的味道在。但绝不缥缈。

四、芙蓉镇：信念与青春的衰落以及神话的终结

衰落与终结是有标志的。

很难讲清《芙蓉镇》的主题是什么。因为它决非先前的影片那样单一，主题与画面的关系也非上述几部伤痕影片那样直接。

没有一个人可以充当另一个人的思想启蒙者和精神鼓舞者。秦书田的出狱释放和胡玉音的幸福重来，并不是靠着哪一类意识形态信念的感召，不是某种神话让人们有勇气熬到幸福的生活，而是因为人有着之所以为人的“活下去，像牲口一样活下去”的忍耐力。是来自外部的强大的政治变革给人们提供了得以生存的条件。无所谓青春，无所谓信念，日子一天天过去，将来就成了现在。

谷燕山因为卖给胡玉音大米头子受牵连挨整治，于是他喝洒他骂娘，在别人不敢接近胡玉音秦书田的时候，他敢；因此他可爱——不是他作为共产党人的信念，也不是他的感召力。谷燕山只是一个正直的好人。

李国香与胡玉音的仇恨很简单，就是她向谷燕山调情都毫无反响，遭人耻笑；而卖米豆腐的胡玉音却将那么多男人勾引得团团转。当只有王秋赦这样既脏又傻的男人接近她的时候，她那样俯就地接受了，但对胡玉音秦书田的惩罚则变本加厉。她也是个可怜的女人。她知道这跟所谓信念或其他名目都无关。这仇恨不会随着